

● 世界史

辛亥革命对中德关系的影响

肖建东

(武汉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湖北武汉 430063)

[作者简介]肖建东(1964-),男,湖南涟源人,武汉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高校政治理论研究。

[摘要]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其间中德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辛亥革命大大冲击了德国的侵华权益,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德关系走向稳定与互利,而辛亥革命的基本精神又促使中德关系最终走向平等。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德关系;稳定;互利;平等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5-0591-07

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是改变中国近代历史命运的一场大革命。本文以中德关系为例,尝试性地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影响。

一、辛亥革命对德国侵华权益的巨大冲击,在客观上促使中德关系走向稳定与互利

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通过三国还辽和借口山东教案,强取山东胶州湾为租借地,以山东为势力范围,利用清政府“新政”之机渗入到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领域,清政府已成为维护德国侵华权益的工具。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矛头直指清王朝,德国侵华权益顿时失去保障。德国此时正忙于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东顾,当务之急便是扑灭革命,力保清王朝。为此,德国公然宣称:德国非常愿意扶助清政府^[1](第 47 页)。

早在武昌起义前夕,德国驻汉口领事获悉起义密谋后,立即向湖广总督瑞澂告密,企图将起义扼杀在摇篮里。但是革命洪流已无法阻挡,武昌起义于 1911 年 10 月 10 日提前爆发了。在革命的炮火中,德国积极保护从武昌逃到汉口德租界的湖广总督瑞澂,协助他电奏清廷速派重兵来鄂和向驻汉口各国领事求援。驻汉口的英、美、法、俄、德 5 国领事为此于 10 月 10 日举行领事团会议,德国领事在会上视革命军为义和团,主张向革命军开战。德国当即派海军舰队前往武汉,其中“老虎”号、“祖国”号、“水獭”号 3 艘炮舰直接配合清军,卷入了对革命军的“热烈战争”^[2](第 231 页)。同时,德国德华银行向清政府提供 100 万两白银的贷款^[3](第 203 页),德国还鼓动消除币制实业借款中的障碍,使清政府得以从中提取经费镇压革命。就在这时,日本与俄国尤其是日本乘机将大批军队开进中国,意欲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德国清楚地意识到,列强间新的瓜分争斗必然会危及实力明显不够的德国远东利益。为了牵制日本与俄国,再加上革命军已宣告不进犯列强在华权益,德国积极伙同其他尚在观望中的列强于 10 月 18 日宣布“局外中立”。但是,德国援助清政府的宗旨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在手法上由明变暗。这时,清军在汉口近郊

刘家庙溃败,急需军费,德国德华银行立即表示愿意暗中配合。湖广总督瑞澂据此致电清政府:“兵费紧急,请速拨银百万两,交德华银行电汇。”^[3](第 213页)此后,德国向清军大量供应军火,为清军装运军火和运送部队。同时,汉口德国租界大量掩护清军的客货车进行军需运输和人员掩护,租界内仓库里存储的大量大米专供清军之需,还掩护清军向武昌城区开炮。在德国的暗中支持下,得势的清军直扑汉阳。在战火中,德国不仅向清军大量供应军需物资,而且还派遣德国军官积极协助清军作战,帮助清军架桥以强渡汉水,使清军顺利地攻占了汉阳。同年底,德国驻奉天领事和德国驻华大使先后请求本国政府援助尚在清廷统治下的奉天,以防止该地滑向革命。由于这一切做得太露骨,引起了其他列强的注意,尤其是日本和俄国,为此,德国政府不得不出面解释:这一切均系德国民间个人所为,与德国政府无关^[3](第 212页),以此蒙混过关。从 1911年 10月下旬开始,武昌起义在全国大多数省份获得响应。为了遏制革命,德国积极伙同其他列强派兵到已爆发革命或可能爆发革命的地区,加强在中国领水和领海的军事警戒,对革命势力进行武力威胁。德国还积极伙同其他列强劫夺各地关税,并以偿付“庚子债务”为名控制革命区域内许多重要税收,根本否认革命军政府的借款资格,企图对革命政权进行经济制裁。尽管如此,革命浪潮仍势不可挡。

面对熊熊的革命烈火,德国寄希望于清政府重用铁腕人物来镇压,实力雄厚且对帝国主义友好的袁世凯便成为德国及其他列强所选中的目标。德国与袁世凯的关系早在天津小站练兵聘任德籍教官时就开始密切起来,袁世凯通过在山东镇压义和团,赞同“东南互保”,后来又曾赞助过未成功的“中美德同盟”计划,自然给德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因此,辛亥革命一爆发,德国驻华公使立即支持美国驻华公使要求清廷起用袁世凯的倡议,认为“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2](第 208页)。在德国及其他列强的敦促下,清廷于 11月 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代表清政府镇压革命。德国闻讯欢欣鼓舞,其驻华公使立即到清政府外务部“道贺”,并伙同其他列强电促袁世凯即日在京商讨对付革命的办法。鉴于清廷国库空虚,德国驻华公使积极鼓动“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贷款,并在给本国首相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不必在乎革命党人对侨民的“暴动”和抵制德货运动,“无保留地立即予袁世凯以金钱协助是应该的”^[2](第 208页)。由于中国革命势力的强烈反对,英国等列强害怕因此危及其侵华权益,致使这一贷款计划搁浅。德国对此十分不满,担心“倘使它(袁世凯政府)得不到钱,它不能镇压革命,欧洲将首先受害”^[2](第 213页)。于是,德国决定单独行动,通过德商瑞记洋行慷慨地贷款资助袁世凯。然而,袁世凯镇压革命的结果是使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到 11月下旬,中国大部分省份纷纷脱离清廷而“独立”。为了阻止革命势力进一步发展,德国伙同其他列强极力敦促袁世凯与起义各省议和。1911年 12月 1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举行。德国一方面伙同其他列强照会和谈双方,声称他们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的注意,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达成足以防止目前冲突的协议,实则压迫革命党人让步;另一方面,德国又替袁世凯打实力牌,鼓动驻山东的北洋陆军第 5镇和其他清军尽可利用德国控制的津浦铁路北段运兵南下,以便与驻扎在徐州的张勋残部一同进逼南京^[4](第 105页)。德国驻华公使后来索性将“中立”幌子放到一边,公开声明:赞同内阁总理(即袁世凯)所代表的政府和策略。然而,革命形势势不可挡。1912年元旦,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享誉海内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袁世凯后院起火,滦州兵变,秦皇岛不稳。德国及其他列强迅速出兵,借口铁路有遭受破坏的危险,分头占领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的铁铁路,帮助袁世凯稳定后方。同时,德国又单独行动,借口不平等条约中关于胶州湾 100里内中国驻军应与德国“会商办理”的规定,威逼刚刚起义的山东即墨革命势力后退,并严禁革命军通过胶州湾附近 100里之地,而后暗中放入清军,杀害革命党人 30多名,阻止革命向北发展^[1](第 54页)。此外,德国积极劝阻英国等其他列强贷款给南京临时政府,还伙同其他列强借口他们劫夺的全部海关税还不足以抵充到期的外债和赔偿,向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一再催索,企图使经费奇缺的革命势力陷入绝境。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袁世凯经费紧缺的问题,德国积极鼓动“四国银行团”将一笔大约 8亿马克的贷款提供给袁世凯政府。由于惧怕革命势力和各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贷款搁浅。德国对此非常不满,德皇威廉二世怒斥英国:这是

“不顾道义地抛开清室的好听的借口”^[2](第 214 页)。为此,德国通过德商瑞记洋行连续两次向清政府贷款 75 万英镑(合银 730 多万两)以购买精良的德奥军火^[5](第 108 页),而德国“细勒细亚”号军舰早已装运大批军火开往华北,随时供清政府备用。

清朝垮台后,德国及其他列强转而扶植势力强大的袁世凯。1912 年 2 月 15 日,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德国与其他列强立即改变原来对临时政府的敌视态度,纷纷向袁世凯道贺。应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要求,德国积极赞助“四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洽商。银行团决定垫款 700 万两白银^[2](第 217 页),德商瑞记洋行还另外提供 45 万英镑^[6](第 35 页),以应袁世凯急需和解散革命军队。然而,南方革命势力并没有完全屈服,孙中山坚持袁世凯必须来南京任职。这时,袁世凯部队在北京、天津与保定间发动兵变,反对袁世凯南下。南京临时政府立即决定从汉口、浦口和烟台调兵北上平乱,但遭袁世凯的断然拒绝。德国闻讯,立即伙同其他列强出兵北京和天津,决定“以强有力的外国军队在通衢大道上担任巡逻”,“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7](第 494 页),借以向革命势力施压。同时,德国伙同其他列强照会袁世凯,将 1911 年暂允中国军队进驻天津周围 20 华里的变通办法作废,“不允许任何类型的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围的禁区”^[7](第 502 页),实质是用武力阻止南方革命军队北上。为了稳住阵脚和增强实力,袁世凯向“四国银行团”请求提供一笔垫款。德国驻华公使积极赞助,主张:“迅速给袁世凯款项,俾他发放兵饷以防再有兵变及扰动事项是迫切的。”^[2](第 216 页)德国的倡议获得有关列强的支持,“四国银行团”遂于 3 月 9 日向袁世凯垫款 110 万两白银^[1](第 62 页),从而稳住了袁世凯的后方。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压力下,南方革命势力在内外交困中屈服,袁世凯于 3 月 10 日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也随之北迁北京。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报答帝国主义的支持,要求国人对于列强,尤须讲信修睦。鉴于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危机仍很严峻,德国参加的“四国银行团”于 3 月中旬决定分期向袁世凯政府提供 1 300 万两白银的垫款,总数为 6 000 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也将尽快启动。在商洽“善后大借款”的过程中,银行团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包括监督原则在内的严苛条件,意在控制中国财政,被袁世凯政府严拒。德国担心此举不利于稳定袁世凯政府而有害于自己的既得利益,于 5 月上旬由德华银行出面表示:“必须给中国政府充分的垫款以支付军饷”,认为此事比“四国银行团”规定的监督原则“还要重要”^[2](第 296 页)。在德国的积极策动下,“四国银行团”总共垫款 5 次,共计白银 1 210 万两,其中 650 万两用于遣散南方革命军队,余数充作袁世凯政府的军政费用^[5](第 108 页)。然而,这种临时性的垫款只能是杯水车薪。1912 年 7—9 月,由于“善后大借款”的谈判仍无转机,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德国除积极清除大借款的障碍和主张放宽贷款条件外,德商曾利用各种名目向袁世凯政府紧急提供了 300 万两白银又 800 万马克的贷款^[1](第 99 页)。1913 年 3 月,德商瑞记洋行第三次向袁世凯政府贷款 30 万英镑,德商捷成洋行也向袁世凯政府陆军部贷款京公砵银 20 多万两;同年 4 月 10 日,由德商瑞记洋行经手,奥国第一次向袁世凯政府贷款 120 万英镑^[5](第 118 页)。这些贷款虽然能给袁世凯政府解决燃眉之急,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恰在此时,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南方革命党人决心武力反袁。德国利用其他列强共同敌视革命的因素,因势利导,促成“善后大借款”合同于 1913 年 4 月 26 日成功签订,贷款总数达 2 500 万英镑^[2](第 377 页)。袁世凯以出让中国财政控制权为代价,用借得的这笔巨款向德国及其他列强购买新式武器,借以加强他的亲信部队和解散或改编南方革命军队,并于 5 月中旬完成了监制南方革命军队的军事部署。德国伙同其他列强密切配合,出动海军分布长江中下游一线,对南方革命势力进行武力威胁。同时,应袁世凯之约,德国克虏伯炮厂准备在 3 个月内提供大批野炮、快枪,加强袁世凯的武装力量。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后,德国及其他列强虽然均宣称“不介入”,却已无法协调一致地发布“中立”声明了。德国外交大臣甚至公然宣称:“德国因它的重大经济利益,不得不要立即扑灭(二次)革命。”^[2](第 270 页)为此,德国在向袁世凯供应大量军火和经费的同时,还派遣军官直接参加段芝贵率领的北洋军进攻江西^[2](第 270 页)。在德国及其他列强的扶助下,袁世凯的战事进行得相当顺利,毫无准备的革命势力很快被他打得七零八落。“二次革命”失败后,德国及其他列强一方面在经济上大量援助袁世凯,借以巩固他的统治

地位,另一方面借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之机希望袁世凯正式确认他们的侵华利益。德国一开始是追随其他列强共同行动的,但它很快发现,日、俄、英正乘机向中国政府敲诈勒索,这是德国所不容的,况且此种争端易引发列强间在华新的争斗,不利于保护德国的既得利益。因此,德国迅速改变立场,申明:中华民国正式总统一经选举产生,德国立即承认中华民国^[2](第 277 页)。然而,袁世凯抵挡不住日、俄、英三国侵略势力,表示严格遵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列强新近获得的侵华权益。由于侵华现状得以维持,出于共同扶植袁世凯的目的,德国与其他列强在袁世凯于 10 月 6 日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次日向袁世凯政府外交部递交了文字措词相同的承认国书,德国外交部就选举结果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表示热烈祝贺^[2](第 385 页)。当然,对于德国的帮助,袁世凯是非常感激的。德国为此欢欣鼓舞,并自信“最近之将来可能特别适宜于保证德国愿望从中国政府得到一个顺利的接受”^[2](第 271 页)。

德国要保障其既得的侵华权益,还须维持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现状,避免因新的纷争而危及德国无力东顾的既得侵华权益。在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日本试图利用西方列强正在准备世界大战而无力东顾之机欲大举独吞中国。为此,德国的对策是:利用其他列强也不愿意日本独吞中国而不利其自身利益的动机,巧妙地联合其他列强制止日本的单独侵华行动。辛亥革命刚爆发时,德国是直接干涉的,后来看到日本军队源源不断开进中国,德国立即警觉地联合其他列强打出“中立”幌子,并利用英国向日本施加影响和压力,阻止了日本单独干涉的企图。在南北议和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派遣 500 名士兵前往汉口,同时不怀好意地资助南北双方,企图在中国内战中混水摸鱼。德国为此与美国紧急磋商,确定了各列强“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迫使日本放弃武力干涉中国的计划^[2](第 102 页)。1912 年 1 月,日、俄两国秘密协定:由日本出兵中国东北,以防止满洲地区卷入到长城以南的混乱。德国闻讯立即联合英国重申不干涉政策,但是日本决心很大,借口“革命党在满洲的骚扰”非常严重,向日本军队发出了准备随时出动的命令。德国急了,立即宣布将采取军事措施保在华德侨,以示对抗。同时考虑到自身力量有限,德国再次与美国紧急磋商,德国代理外相还直接警告日本:“难以同意日本国此时对中国采取单独行动。”^[8](第 372 页)美国从一贯推行“门户开放”的宗旨出发,于 1912 年 2 月 8 日将美国给德国的复函同时在华盛顿和柏林发表,并分别送达英、法、俄、荷、奥匈等国政府,重申不干涉中国的原则,得到各国政府的一致赞同,被完全孤立的日本只得被迫同意。1913 年 9 月,发生了张勋杀害日本人所引起的南京事件,正愁无缝可钻的日本立即借此提出种种勒索和要求,杀气腾腾地准备动用武力。德国立即联合英国牵制日本,加上袁世凯已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日本武力干涉的企图才没有得逞。正是由于德国利用了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和美日之间的矛盾,才形成了帝国主义列强间彼此相互制约的局面,从而避免了新的瓜分中国狂潮的出现,确保了德国的既得权益。

可以说,辛亥革命对中德关系的直接影响就是对德国既得侵华权益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因而,德国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的基本策略是:竭力维护德国既得的侵华权益。为此,德国积极扶助清政府和袁世凯势力来维护其既得的侵华权益,竭力镇压革命;同时,成功地阻止了日、俄两国尤其是日本的单独侵华行动,避免了新的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的既得利益也因此避免了灾难性的冲击。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冲垮德国既得的侵华权益,却迫使因准备世界大战而无力东顾的德国转而采取睦华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政府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统一与稳定。正因为如此,中德关系在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呈现出稳定与互利的态势。

二、辛亥革命的基本精神促使中德关系最终走向平等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种西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现在外交上,就是要学会并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外交手段与国际惯例为国家利益服务,其核心是重契约(如条约、协定等),争取与世界各国平等。这种体现既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需要,也是当时中国统治者维护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因而是大势所趋。因此,中华民国成立时,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演说中承认了所

有的不平等条约,继任的袁世凯也做了类似的承诺,并通令各地讲究约章,切实遵守。当然,由于当时形势所逼,这种近代化的外交带有浓厚的屈辱色彩,其作用在于避免帝国主义新的瓜分狂潮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中德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朝着稳定与互利的方向发展。袁世凯当时非常钦佩德皇威廉二世称霸全欧的强权政治与德国著名宰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常说中国要在东亚图强必学德国与模仿德国及获得成功的日本。因此,袁世凯聘请大批德国人来华工作,帮助国内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在军事近代化方面,袁世凯完全采用了德国的军事教育方式。德国乘机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特别在经济领域,积极参与对华的铁路借款和盐务借款,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继续显示出稳定与互利的特点,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风波。当时中国财政全靠外债维持,为此向包括德国在内的“五国银行团”申请一笔 2 500 万英镑的新借款,建议由银行团选择抵押品。银行团拟准备把未付诸实施的 1911 年币制实业借款扩大为第二期善后借款,该款原定以满洲税收作为担保。视满洲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日、俄闻讯反对,银行团立场动摇。但中国政府不能容忍这种霸道的侵略行径,坚持以满洲税收作担保,并拒绝日、俄两国银行代表参与贷款谈判^[2](第 387 页)。由于银行团内部的争夺而使贷款交涉陷于停顿,中国政府决定将借款总额由 2 500 万英镑减为 1 500 万英镑,便于早日获得现款。开始与中国保持相同立场的德国这时闻讯反对中国,理由是借款总额的减少将意味着短期债务的再次缓偿,而德国的短期对华贷款比较多,因此警告中国当局:此举会“损害中国的信用”^[2](第 393 页)。经过再三权衡,中国政府越来越觉得大借款不易实现,尤其是缔结币制实业借款有可能完全陷于依靠对华侵略野心最大的日本。从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需要出发,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听从德国的劝告,反而将借款再减到 800 万英镑,并剔除币制实业借款。借款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体现了中国外交在中德关系中的主动性,敢于运用西方外交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德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波折,而中国外交在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外交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显得更加主动和成熟。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错综复杂的斗争极易把中国拖入战火,中国政府于 1914 年 8 月 6 日果断地宣布中立。德国立即赞成,因为这符合德国维持东亚现状的愿望。野心勃勃的日本却要打破现状,倒向协约国,于 1914 年 8 月 15 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胶州湾无条件地交付日本,企图以此为基础独霸中国。德国自知无力抵抗日本,连忙向中国政府表示可以立即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日本却蛮横地阻止中国与德国会谈,于 9 月 2 日进攻山东德军,并公然将胶济铁路完全置于日本的军事控制之下。中国对日本霸道的侵略行径非常愤慨,多次抗议。为此,中国政府一方面请求美国会同英国设法阻止日军扩大行军区域,另一方面与驻华日使会商,要求按国际法规定的交战兵舰在中立地区内应由中立国解除武装的惯例,胶济铁路应由中国接管。这也符合德国的利益,德国立即同意将胶济铁路交给中国接管,等候战后解决^[9](第 67 页)。然而,日本一概拒绝答复。中国政府在抗议之余,只好让山东地方当局同日本侵略军签订维持地方治安的地方性条款,以防侵据胶济线的日军越出范围,但声明这并不是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占领。在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过程中,中德关系中稳定与互利的特点由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的中立只能是暂时的,各交战国在中国的明争暗斗必然会把中国拖入战火。1915 年秋冬之际,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均在拉拢中国加入战火。由于日本与协约国在远东的势力远远超过德国,袁世凯拟倾向协约国集团,想藉此取得英、法、俄等国对其帝制活动的支持,还可取得协约国在财政、军事上的资助,并乘参战之机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遏制日本的侵华势力。于是,袁世凯政府提出:由协约国立即借给中国 200 万英镑,作为参战的交换条件^[1](第 216 页)。德国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极力争取中国,甚至在袁世凯帝制活动于国内外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德、奥两国公使敢于前往袁世凯政府祝贺,并要求晋见袁世凯。但袁世凯从有利国家的利益出发,排除个人的感情因素,借故拒绝^[1](第 182 页)。1917 年 2 月,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的潜水艇战争政策。美国借此对德国宣战,并积极拉拢中国入伙,保证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害。此时袁世凯已去世,掌管中国政府实权的段祺瑞政府继续袁世凯的外交政策。就德国的新政策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9](第 76 页)。为了阻止中国倒

向协约国,德国驻华公使四处奔走,甚至采取“银弹攻势”即贿赂中国政府要人,但无济于事。段祺瑞于 2 月 28 日向协约国驻华公使提出了中国参战的三条希望条款: 1. 逐步提高中国的关税至值百抽七点五; 2. 废止《辛丑和约》及附属文件中有碍中国防范德国行动的有关军事部分的条款; 3. 延缓 10 年偿付庚子赔款,并不另加利息。在这些条款的基础上,中国政府答应给协约国提供原料和劳工^[9](第 89 页)。由此可见,中国参战的目的是在于收回国家的部分主权。协约国原则上同意中国的条件,但希望中国先行对德宣战。1917 年 3 月初,一艘载有 500 名华工的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没。段祺瑞趁机于 3 月 14 日宣布与德国绝交,先后收回了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解除在华境内的德国武装,没收德国在华的侵略财产,基本废除德国的领事裁判权,但是保护在华境内的普通德国民众,也尊重德国皇族的称呼^[2](第 57 页)。德国很不甘心自己的既得侵华权益的丧失,秘密资助张勋复辟帝制,以期“开复中某(指德国)国交”^[4](第 74 页)。然而,张勋的复辟如同昙花一现,段祺瑞迅速从天津率军进入北京,打败张勋,重掌中国政府实权。1917 年 8 月 14 日,中国政府正式向德、奥宣战,在废除德国在华侵略权益的基础上,废除了奥匈帝国在华的一切侵略权益,但是对中国境内的德奥民众仍持保护态度^[1](第 219-277 页),这一行动成为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声。

中国是被动地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中的,但中国政府变被动为主动,运用谈判、协商、绝交与宣战等西方资本主义的外交手段与国际惯例,废除了中国与德、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它们的种种侵华权益,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日本的侵略扩张,不费一枪一弹地维护了本国的根本利益。德国虽然不甘心,却不得不因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失去了它在本国以外的一切殖民利益。同时,德国也注意到中国政府仅仅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且中国政府对德国民众是宽容的,中德间的商务活动并未受到中国政府的阻止。后来迫于协约国的压力,于 1918 年 5 月 17 日颁布了一项禁止与敌通商条例,但亦未严格执行。直到战后,由于美、英施加压力,2 000 多名德国人才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1](第 229 页)。中国对德关系的处理是公正的和明智的,中国只是要求平等。因此,德国仍然对中国有好感,中德关系的基础仍然很牢固。这是中国政府灵活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外交手段与国际惯例的必然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也以战胜国资格参加。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在承诺归还德国种种侵华权益的同时,却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神州共怒,中国人民纷起抗争。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即《对德和约》)上签字。德国也不甘心将其在山东的权益交付给日本。由于共同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欺压的原因,中德两国开始了恢复两国邦交的行动。1919 年 9 月,中国大总统正式宣布对德恢复和平,但是声明:自中国宣战后,中国对德奥两国人民所订各项章程,非有废止或修改明文,仍应继续有效。这表明中国政府对收回被夺去的侵略权益的公正立场。此时的德国正欲在夹缝里求生存,急于与资源丰富的中国合作以振兴本国惨遭毁灭的经济。因此,新成立的德国共和政府对于《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的条款除山东 3 条外,不论中国签字与否,一律遵照执行。于是,中德两国关系在互利的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20 年 7 月,以德国公使冯·博尔希为团长的德国代表团来到中国,要求恢复中德之间的通商,重建两国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同时提出非正式声明与正式声明书,放弃德国在中国的一切侵略权益。中国政府对此积极响应,两国频繁地磋商,于 1921 年 5 月 20 日在德国声明文书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德协约》。协约规定: 1. 恢复中德两国邦交,建立尊重主权与平等互利的新型关系; 2. 废除德国在华的其他一切侵华权益,废除德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偿还中国在各处收容德国军人的费用,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保全了中国日后索回山东主权的权利; 3. 以本协约及德国声明文书作为将来中德间协约的根据^[10](第 10 页)。《中德协约》签订后,又经照会往返说明,中德关系至此完全恢复正常。此后,战时的禁锢被完全打破,中德间以平等互惠的原则发展着双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

1921 年的《中德协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在这个协约中,中德双方的地位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协约内容互惠互利,从实际作用来看,完全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是近代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一个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平等互利的条约,开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外交的新纪元。不仅如此,《中

德协约》还废除了德国在中国的一切侵略权益,保全了中国日后向日本收回山东主权的权利,成为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声。当时的《东方杂志》怀着兴奋的心情很有影响地评述说:《中德协约》的签订“使吾国国际地位顿形增高。数十年来,吾国外交之足以扬眉吐气者,惟此一事而已”,“故吾于新约之签字,对中德关系之将来,抱无限之乐观也”^[11](第 99-100 页)。这一成果的取得,固然是德国战败后无力维持不平等条约的结果,但也反映了在辛亥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坚持用在辛亥革命烈火中确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现在中国外交上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中德关系的发展中始终占据主动权,因而辛亥革命的基本精神是促使中德关系最终走向平等的根本因素。

总之,辛亥革命严重地冲击了德国既得的侵华权益,在客观上促使中德关系走向稳定与互利,而辛亥革命的基本精神促使中德关系最终走向平等。这是辛亥革命在外交领域中的一大硕果。

参 考 文 献

- [1] 张忠绂. 中华民国外交史(一)[M]. 南京:正中书局,1945.
- [2] 孙瑞芹.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第 3 卷[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 [3] 陈旭麓.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4]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山东假独立资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5] 徐义生. 中国近代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 贾士毅. 民国财政史:下册[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 [7] 胡滨.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择: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 [日]信夫清之郎. 日本外交史:上册[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
- [9] 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6 卷[M]. 上海:三联书店,1980.
- [10] 外交文牍. 中德协约[S]. 原件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11] 蒋恭晟. 中德外交史[M]. 上海:中华书局,192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XIAO Jian-d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3,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AO Jian-dong(1964-), mal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joring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academic political theories.

Abstract 1911 Relation in China had promoted the proces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diplomacy. I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on China and Germany was a model.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impacted very greatly the vested interest of Germany aggressing against China, and prompted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Germany making for steady and interbenefit objectively. Further, the fundamental spirits of 1911 Revolution prompted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Germany making for equality finally too.

Key words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Germany; Steady; Interbenefit; Equality